

光绪朝安徽清赋运动研究*

舒 满 君

〔摘 要〕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安徽巡抚福润题请清赋。安徽省官员希望通过清查荒芜及隐匿的田产,增加田赋征收数额,以应甲午战后清廷财政之需,故专门在省城安庆设立清赋总局,以推行清赋。安徽省清赋之事,因需重新造册,牵涉州县官员、胥吏、士绅多方利益,落实到州县往往演变为利权之争,贵池县的清赋情形即是例证。总体上,透过这些争端,可以看到地方士绅积极的政治参与,同样也看到,争议之下的安徽清赋运动整体效果并不显著。

〔关键词〕光绪朝;安徽清赋;贵池县;册籍之争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9)11-0036-08

太平天国战争后,南方各省人口凋零,清廷鼓励开垦,各省屡有减赋、清赋之举^①。台湾设省(光绪十一年,即 1885 年)后,巡抚刘铭传推行清赋。对此,黄天祝、林玉茹、李文良分别从边疆财政经略、地权分配等角度撰文论述^②。光绪初期的清赋,可视为户部试图规复旧制之举,各处收效不一^③,荒熟田地并未得到彻底清查。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与日本明治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赔款 2 亿两白银,甲午战争的耗费与赔款给清政府造成巨大压力。为筹饷银与赔款,安徽、江南等省先后发起清赋运动。关于江南的清赋,学界关注较多,如从财政管理体系切入,剖析清末中央与地方的关系^④;或对光绪二十五年刚毅江南清赋的史实进行梳理,着重分析清赋事件对江南士气及社会权力格局的影响^⑤。甲午战前的清赋可视为清廷规复旧制的努力,甲午战后的清赋是清廷财政筹款的方式。学界虽对江南、台湾的清赋运动着墨较多,其他省份尚未见系统研究,但由于历史发展进程和行政区划的不同,两者的研究角度与旨趣有显著差异。清赋运动是观察清末中央、地方关系以及地方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

《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下称《酌存》)、《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下称《辑存》)、《安省奏办清赋查报田粮总册》(下称《田粮总册》),是探讨安徽清赋问题的核心史料。《酌存》《辑存》均为当时安徽布政使于荫霖所辑。《酌存》共四卷,收录《中国华东文献丛书》第三辑《华东史地文献》第二十三卷之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徽州的田赋定额与州县实证研究”(19CZS029)。

① 夏鼐最早关注到太平天国战后长江沿线的田赋整理,此后刘克祥对 19 世纪清政府的清赋运动有过整体性概述[参见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清华学报》第 10 卷第 2 期,1935 年,第 409~474 页;刘克祥:《十九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清政府的减赋和清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94~350 页]。

② 黄天祝:《略论刘铭传在台湾实行的丈田清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 年第 2 期,第 104~107 页;林玉茹:《由鱼鳞图册看清末后山的清赋事业与地权分配形态》,《东台湾研究》1997 年第 2 期,第 131~168 页;李文良:《晚清台湾清赋事业的再考察——“减四留六”的决策过程与意义》,《汉学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387~416 页。

③ 刘增合:《光绪前期户部整顿财政中的规复旧制及其限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9 本,2008 年,第 235~299 页。

④ 何汉威:《从清末刚毅、铁良南巡看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68 本,1997 年,第 55~115 页。

⑤ 范金民:《清末刚毅江苏清赋之考察》,《明清论丛》第 15 辑,2015 年,第 286~306 页;赵思渊:《清末苏南赋税征收与地方社会——以光绪二十五年刚毅南巡清理田赋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73~84 页;赵思渊:《士气之藩篱:清末常熟清赋中的士绅身份意识转变》,《历史研究》2016 年第 6 期,第 70~85 页。

中。《辑存》共十二卷,南京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本文所用为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酌存》《辑存》是于荫霖对清赋筹备、施行过程中各种议案、奏折、批牍、札文内容进行的辑录。林齐模、顾建娣曾使用《酌存》对太平天国战后安徽的田赋征收进行过描述^①,但二人未留意《酌存》所辑内容为清赋筹备时期的情形,未能揭露清赋推行的方式、过程以及各县的反应,而这些内容刚好在《辑存》中得以保留。并且,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田粮总册》一册,封面页印有“督办安徽清查田赋总局关防”,专门对光绪朝安徽各县清赋结果进行汇总。由此可见,《酌存》《辑存》《田粮总册》是可以相互补充和印证的史料体系,构成了光绪年间安徽清赋运动从筹备、推行到结束的完整记述。除此以外,笔者还发现上海图书馆藏有《贵池清赋刍言》(编号:线普 485221,民国四年木活字本),其中包含清赋前后贵池地方士绅王源翰与贵池县令往来的手折、书信,涉及清赋在贵池县的落实情况。《贵池清赋刍言》作为州县士绅的记录,可让我们更深入地看到安徽清赋的实践形态,丰富了史料的层次。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拟对光绪朝安徽清赋运动进行系统梳理,然后以贵池县清赋为例,重点观察官员、胥吏、士绅群体在清赋运动中的立场与角力过程,勾画清赋运动在省、县行政中的演变趋势。最后通过与江南清赋的对比,总结安徽清赋的效果与社会影响。

一 清赋运动的发起与展开

安徽清赋运动是在甲午战后发起的。此时内地承平较久,清查土地,增加田赋实征数额成为筹备饷需和赔款的渠道之一。安徽省清赋的保守目标是展复到太平天国战前的数额。皖省清赋一事,由巡抚福润、布政使于荫霖合力办理,其以马丕瑶的解州清丈为参考,本拟通省全面清丈,清厘州县隐匿田产,以此增加田赋收入。但在实际运作阶段,全面清丈之法成为陈报——巡查之法的备选,最终被搁置、不了了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调任安徽巡抚的福润提出要“实力征收,求复原额”,并称已有令各府州县查荒之举^②。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福润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折,提出筹款、用人、执法、宽丈法、定民志、励人才的清丈办法六条,据称该办法乃布政使于荫霖、按察使赵尔巽所建议^③。该折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得旨允准^④。

皖省官员认为丈田事理繁重,需费较多,马丕瑶的解州清丈,最称得法,可以效仿。为了办好清赋,于荫霖还选印马丕瑶《解州清丈地粮章程(图说附)》的相关内容,其中占主要篇幅的是《解州清丈地粮章程》和《丈清地粮以后永定章程》。于荫霖称:“今将解州章程重付之梓,图说录其七以见崖略,余则省焉。其中如查粮、丈地、择人、造册各条,后有智者,无以易之”^⑤。解州清丈的原则是“先查粮后丈地,官筹款绅择人”^⑥。具体方法是在城设立公局,拣选绅董负责局务,并赴各里组织清查户口,清丈土地,造鱼鳞草册和户口粮地册,各村册籍造定后雇书手誊抄,制成鱼鳞图册、征粮簿册各两套,其中一套鱼鳞图册、征粮簿册分别存州署库房和粮房,另一套存各村公庙^⑦。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间,《解州清丈地粮章程(图说附)》被发往安徽各州县以作为清赋的示范和参考。由此可见,全面清丈造册是安徽省清赋的最初立意。然而,解州不过一直隶州,辖区范围较窄,马丕瑶发动士绅近40人,从光绪五年(1879年)十月至光绪七年五月,耗时一年半方才完成^⑧。安徽省

① 顾建娣:《十九世纪中期安徽的田赋征收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2005 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7~59 页;林齐模:《旧制度的危机——太平天国战争对安徽田赋征收的影响》,《安徽史学》2002 年第 3 期,第 23~32 页。

② 福润:《奏为遵旨筹议时务分晰复陈酌夺办理情形事》(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5612-016。

③ 《清赋纪略》,冯煦主修、陈师礼纂:《皖政辑要》,合肥:黄山书社 2005 年版,第 233 页。

④ 《清德宗实录》卷三八八,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上,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66 页。

⑤⑥⑦ 马丕瑶:《解州清丈地粮章程(图说附)》,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税收档案史料汇编》第 54 册,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 2008 年版,第 26397、26403~26424、26424 页。

⑧ 马丕瑶列举绅董 39 人,见马丕瑶:《解州清丈地粮章程(图说附)》,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税收档案史料汇编》第 54 册,第 26425 页。

当时辖有八个府和五直隶州,下辖四个散州、五十一个县、九个卫,全面清赋之难可想而知。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安徽清赋总局在省城安庆开局。清赋总局的设立意味着皖省清赋一事的全面铺开,各州县所有有关清赋之公文皆经由该局处理。清赋总局成立后,巡抚福润及清赋总局随即发布告示,对清赋的宗旨和方法分别告知。福润的告示规定首报(即业主自行陈报)限期在光绪二十二年七月至十一月,十一月各州县将陈报情况汇总上报至清赋总局,由清赋总局就各县首报情况再行议定后续办法^①。清赋总局又颁布《清粮查荒勘丈简要章程》八条^②。在清赋总局的主导下,清赋正式分为陈报和巡查两个阶段,光绪二十二年七月至十一月是令业户自行陈报的时间,是清赋的第一阶段。十二月,清赋总局开始委派官员赴皖省各州县巡查清赋进程,是清赋的第二阶段。清赋总局试图待陈报有结果,确定陈报数额是否能够合足旧额,再决定是否推行全面清丈。

从八月份的札文可知,虽然七月皖省开始设清赋总局办理各项赋税事宜,但因期间穿插奏报秋成之事,各州县清赋多有耽搁^③。至十二月,清赋总局规定的首报期限截止,未陈报相关信息的州县尚有30余个^④。为督促各府州县陈报,清赋总局只得委派各员巡查皖省各处,并将沿途情形禀复总局,此为皖省清赋的第二阶段。据十二月的札文来看,此次巡查派员有潘文铎、王康平、龙凤鏊、何彬衡、刘佐宸、方永昌、王大庆等,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条线路,派往皖省各县巡查清赋进度^⑤。巡查结束后各委员陆续回禀各县清赋详情,其后还针对个别州县进行了重点整治,比如徽州府婺源县,池州府青阳县,凤阳府定远县、凤阳县、怀远县以及宿州,宁国府泾县等。第二阶段的清赋举措,除了派员巡查以外,光绪二十三年二、三、四月间,清赋总局屡次札飭各州县官及卫所官员下乡勘察,令各县奏报造册进度,尽快提交清册。

光绪二十二年年底,按照清赋总局的计划,在经过首报和委员巡查之后,需要综合分析各县的陈报情况,决定是否再行清丈。从各县的陈报及委员的查勘情况来看,大部分州县只是陈报了查荒结果,仅有个别州县(宣城)在此次清赋中编造了清丈鱼鳞图册,其他州县无论是在首报、查勘期间,还是在其后,均未进行清丈。清赋总局亦未再行要求各州县进行清丈,清丈之议最终不了了之。

全面清丈之法被搁置其实在清赋方法尚未确定之前已埋下伏笔。《酌存》中有《各属清丈办法》一篇,乃于荫霖所辑各府县属官对于清丈之议的反馈,其中有两种意见较具代表性:第一,表示清丈可行但经费难以筹措,宁国府知府桂鏊、广德知州钱文翼等执此观点;第二,主张采取先陈报后清丈的方法,和州顾怀壬、朱大绅,含山蔡光裕,霍邱王树鼎,南陵孙玉铭等均持此观点^⑥。巡抚福润曾奏调孙葆田协助皖省清赋,孙氏称:“清赋之要,熟地报荒者,当宽其既往,限年垦复;平岁报灾者,当警其将来,分年带征。弊自可除,无事纷扰”^⑦,其主张陈报之法,一时间传为名言。州县亦有“至清丈之法,弊实滋多,非一言可尽”^⑧的议论。

无论是清丈还是陈报,最终结果是试图重新造就一套田亩册籍作为州县田赋征收的依据与标准,将太平天国战争后开垦、复垦的土地重新纳入赋税征缴体系,目的是提高田赋征收的有效性和征收份额。但正如光绪《霍山县志》所言:“官以为清查,民以为加赋,胥吏乘之扰民而无济于正供”^⑨,清赋一事对于省级官府、州县官员、胥吏、士绅、乡民各群体而言,内涵有所不同。对于省级官府而言,清丈、陈报均是查荒的方法,查荒是增加实收的手段;对于州县官而言,全面清丈造册是程序繁杂,需费尽心

① 《抚部院福示》,于荫霖辑:《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卷五,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第4页。

② 《局示》,于荫霖辑:《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卷五,第9~12页。

③ 奏报秋成、秋灾事较复杂,笔者将另文撰述,此不赘述[《札怀潜等三十四州县》(八月),于荫霖辑:《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卷六,第7、8页]。

④ 《札奏调委员潘牧文铎、委员何守彬衡、王牧康平、丁牧文炳、龙丞凤鏊、刘令佐宸、方令永昌》(十二月),于荫霖辑:《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卷六,第17页。

⑤ 《清赋文言》,《申报》,1897年1月19日,第2版。

⑥ 于荫霖编:《安徽清理田赋案牍酌存》卷二,《中国华东文献丛书》第3辑第93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217页。

⑦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四七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89页。

⑧ 《灾荒缺额总论》,于荫霖辑:《安徽清理田赋案牍酌存》卷一,《中国华东文献丛书》第3辑第93册,第178页。

⑨ 光绪《霍山县志》卷四《赋役志·赋额》,《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13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力,且不一定能够在任期内完成,政绩不显,陈报造册程序简便、效果立时显现,且可增加契税收入;对于胥吏而言,在掌握旧册控制征收的形势下,新册编造必然对旧有征收体系造成冲击,利权恐有损失;对于士绅与乡民而言,新册编造乃摆脱胥吏把持征收的机会。因此,在州县与乡村,重新编造册籍将导致各群体在田赋征收权势上的调整,册籍的编造与应用则视为各群体力争利益最大化的博弈过程,其具体情形之纷繁复杂,贵池士绅王源翰多有记录,可略作参考。

二 贵池县胥吏与士绅的册籍之争

清赋前期的组织与筹备主要由各省级衙门与官员负责,安庆清赋总局颁布章程、确定方案之后,清赋在各县全面铺开。省级衙门的功能主要在决策与督促,落实到州县,州县清赋与省级衙门所面临的问题截然不同。表面上看,州县清赋的任务不过是克尽清查造册之责,实际运作中却往往演变为利权之争,贵池县的情况即是例证。

贵池县向有保书包收包缴之弊,“咸丰初,发匪踞城,官册散失殆尽,仅凭各保书推收混乱册稿为征粮张本,由保书包收包缴。始则试征一二千担,历岁递加至四五千、六七千担而止。尚复措串抵官、吞灾捏欠。而取之花户,则无论田之荒熟、岁之丰歉,一以一万六千四百余担之原额为衡。每额米一担,又视花户之强弱邪正,定价八九千至十四五千不等”^①。官册之失使得官府失去对征收的控制,保书因有推收私册在手而得以把持田赋征收。在王源翰看来,保书群体是清赋的第一大障碍。此种情形,贵池县并非个例,姚锡光的《吏皖存牍》里的石台县亦如是。

清赋伊始,士绅群体与保书群体即处于对立面。贵池名士章兆鸿时在邑中,其称:“邑绅在事者,唯吾友王涤斋功为多”^②,王涤斋即王源翰,贵池人,曾入贵池刘含芳(字芑林,光绪十七年调补登莱青兵备道,淮军将领)幕府。甲午战败后,王源翰奉刘含芳之命赴烟台接收旅顺,后回籍。王源翰作为诸绅之代表,切实参与了贵池县的清赋之事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源翰自称“既归,而吾皖省清赋之议起矣,于是私相额颂,曰贵池三十余年沉痾不起之疾,今其有疗乎?”^③王源翰所谓“三十余年沉痾不起之疾”即指的是保书包收包缴之弊。王源翰初闻清赋之议,对全面清丈颇有疑虑,曾提出筹办之议、省累之议、善后之议各两条,主要内容包括雇人测绘、不假胥吏之手,令三十九保各划疆界分饬造册呈核,宽既往,立粮柜行自封投柜,立城乡归户册管理推收,分别荒熟核实岁额等项^④,其中部分意见被贵池县令柯劭戾订立清赋章程时采纳。

柯劭戾有意将清赋造册之事交给士绅办理,以压制保书把持征收的势头,声称“其所以必责成绅董者,以卑县征收之权偏重于保书,如再令保书查报,必有益无损,故也”^⑤。据王源翰的记载,参与清赋的绅董除了其本人以外,尚有贡生彭振、吕鸣鹤、张德华,监生叶钧、张彬、郑毓钟,秀才汪宪模、董润升,守戎方胜桂,例贡章江、杨海筹,太学生章必选、章学文、邓文瑞诸人。在王源翰等当地士绅和县令柯劭戾的共同努力下,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左右,贵池县成立清赋局。柯劭戾按照省局要求订立清赋章程一册以及晓谕各董保清赋办法十二条。章程规定业户可以自陈己业,以契为据,印契、白契、抄契、典契、靠契(含义未明,待考),抑或是契据遗失等情况均有不同处理方式,未税之契先赴清赋局契税,然后陈报^⑥。光绪二十三年五月,柯劭戾禀折上亦称造册完毕,虽然原额尚未展复,但每年可多征一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两八钱^⑦。士绅重新造册看似颇为顺利,但贵池清赋局欲以此新册启征丁漕,却遭到了保书群体的集体围攻,困难重重。

光绪二十三年上忙^⑧亟待启征之时,依清赋新册征收之议遭到持有旧册的保书群体的激烈反对,

①④ 王源翰:《贵池清丈议并序》(光绪二十二年五月),《贵池清赋刍议》卷上,上海图书馆藏,第3、4、6页。

② 章兆鸿:《贵池清丈言序》,《贵池清赋刍议》卷上,第1页。

③ 王源翰:《与邑人论清赋善后书》,《贵池清赋刍议》卷下,第41页。

⑤⑥ 《署贵池县知县柯劭戾禀》(二十二年八月),于荫霖辑:《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卷八,第4、9~10页。

⑦ 《署贵池县知县柯劭戾禀》(二十三年五月),于荫霖辑:《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卷八,第28页。

⑧ 按:清末州县田赋征收多分为两期,称上忙、下忙。

几乎酿成事变。贵池县保书群体声言要“新旧搀征”，此处“新旧”乃至新旧册籍，即保书原有册籍和士绅清赋新造册籍。保书群体在启征之前已经上诉至池州知府文明处，并取得了文明的支持。五月十二日，开征期迫，绅董聚集在县令柯劭愍处。但贵池知府文明向柯劭愍发出了“现查熟田若干，迅归旧册并案启征”^①的檄文，令柯劭愍照旧册征收。除了贵池知府的檄文，柯氏还称：“乃近日保书百十成群，更番迭进，稽首崩角，乞怜不休。余力持不可，则长跪至夜分不肯起，心颇为动。在署诸友因赞成是议，此一念恻隐害之也。”^②在清赋册籍完成之际，保书群体先后动摇了幕友及县令，并与池州知府联合向知县柯劭愍施压。

五月十三日，柯劭愍决定依诸绅董保之议，照清赋新册征收。彼时“保书率男妇数百人截县门，谋胁之”^③，保书群体还率众人清赋局，欲挠毁新造册籍，柯劭愍听闻保书此举，命令捕治，保书方率众离去^④。是日夜，保书率众先集于保总局（此局乃嘉庆末贵池知县卢元荣私祠，卢元荣在其任开启了贵池县漕粮加耗，后任递加之规，被保书立祠私祀），然后发起了对士绅群体的攻击^⑤。士绅章学文至柯劭愍处禀告此变，柯劭愍率人平息此事，力惩保书数人，王源翰等乘机建议行自封投柜于贵池。在士绅和县令的强力弹压之下，保书气焰稍被压制。

光绪二十三年冬，柯劭愍调任太湖，离任之日，“保书蜂起掷瓦石碎屑，肩舆赖乡民夹道卫送，城守亦率兵击却之，得就艇”^⑥。柯氏离任后，保书发起新一轮的反扑。保书群体贿赂池州府知府（文明）之子及其姻亲、幕僚，试图恢复保书包征。王源翰递手折于新任知县方免于包征。保书群体屡屡试图恢复旧册征收，不能如愿，遂以“抗粮构讼”^⑦为名，将各绅董诉于知府。池州知府文明还将此事通禀至安徽巡抚、布政使等处，文明所述如下：

访闻贵池县清赋案内劣绅章学文、方胜桂、叶钧、姚吉晖等在于郡城施家湾地方私设四乡公局，按亩敛费，至数千元之多，把持公家，抗粮构讼。凡有乡民来城完粮者，务先勒令至局听其行止。现在该县漕粮开征至今，乡民观望，毫无起色，皆由该董等把持所致^⑧。

从上引资料可知，池州府知府文明意欲将小民观望不完粮的原因归咎于诸绅董，认为诸绅董有把持粮政利权之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清赋总局委派邓嘉缜、周麟述往池州查办章学文等“把持敛费”之事。二人沿途访闻，并听取池州知府文明、贵池县张令面言。面对清赋总局委员的面询，知府文明承认前引通禀中所称内容，仅“每亩敛费十文”一项，确有依据，并责难四乡公局系绅董敛费置买^⑨，此前所列其他有关把持、抗粮等项并无所凭。

接任贵池县张令称：“该绅章学文等办理清赋，未闻有何劣迹，亦无控案。设局一事，系由四乡绅衿在柯前令任内禀准，在城设立公所，举办劝善、兴利、存册、会课等项，经柯令批准并捐廉为倡，原案钞呈。”^⑩该县令指出四乡公所乃柯劭愍捐廉倡建，澄清了文明所谓敛费置买四乡公所之说。县令张氏还指出，“本年定丁漕责成约保鸣锣催完，并不借重董事投柜完粮，百姓称便，欢欣鼓舞”^⑪，表明绅董并未参与征收事宜。

邓嘉缜、周麟述依据文、张二人所言，并结合在贵池访闻情形，指出：“此次文守所禀各情，核诸县案，微有参差，则缘柯令之批准设局及裁革保书、革除由单等事，均未禀府有案。文守因征收不见起色，又见该绅等设局捐费，实有其事，是以缮发通禀”^⑫。针对贵池知府文明所称公所每亩敛费之说，邓、周访查后称：“（乡民）甘愿出费，众口同声，以为有益”^⑬。经邓、周二回禀，“方伯、廉访大怒，请两院降之罚。今大中丞邓公为宽其事，自是太守视邑绅如眼中玉屑矣”^⑭。方伯、廉访指布政使于荫霖、按察使赵尔巽。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接任安徽巡抚邓华熙仍令裁革保书，但认为委员禀覆中尚有“不实不尽之处”，对知府文明有所维护，绅董免深究，县令柯劭愍记过一次^⑮。

贵池清赋之事借由知府文明通禀上宪扩大了影响。因贵池清赋乃知县柯劭愍一力推行，其中历

①②③④⑤⑥⑦⑩ 王源翰：《贵池清赋刍议》卷下，第5、6、8、8、9、10、10~12、12页。

⑧⑨ 《委员奏调同知直隶州邓嘉缜、候补知县周麟述会禀》，于荫霖辑：《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卷十，第19、20、23页。

⑪⑫⑬ 于荫霖辑：《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卷十，第31、21、25、33页。

⑭ 于荫霖辑：《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卷三，第21页。

经艰险并受责罚,赵尔巽彼时任安徽按察使,深知其中故事,故而在其编撰《清史稿》时为柯劭戾立传,称其为儒吏,有“吏百计挠之,不为动”一句,此吏乃指贵池保书。赵氏还指出邓华熙曾“听浮言”弹劾柯劭戾,此“浮言”当来自池州府知府文明,而柯劭戾得免于处罚在于两江总督刘坤一^①。据称,彼时王源翰、姚景崇曾赴江宁,将其中故事诉之于刘世珩,刘世珩是贵池刘瑞芬(淮军出身,官至广东巡抚,曾出使英、俄等国)之子,近代著名出版家、收藏家,刘世珩再行禀告刘坤一,使柯劭戾最终免于处分^②。

综上可知,在此次保书与士绅的新旧册籍之争中,士绅获得了胜利。贵池县此次清赋造就官、乡两套册籍,官册在县署存档,不经各书之手,乡册由各保公同管理,保书旧册彻底被废弃。光绪三十年(1904年)前后,贵池县署被焚,册籍遭毁,安徽藩司尚有调取乡册进行修复之举^③。从造册的成效来看,贵池清赋的结果在当时无疑可视作为光绪朝安徽清赋的典范之一。

就安徽清赋的整体情况而言,在实际的行政中,各县所面临的情况不一,围绕清赋产生的利权之争,其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有的表现为册籍之争^④,有的表现为牌价之差、荒熟之别(例如歙县)。由于全面清丈之议被搁置,除了宣城、贵池以外,皖省其他州县似乎均未能全然重新造册^⑤。这些纷争,特别是在皖南,有相似的趋势,即士绅群体表现出情绪的高涨和积极参与,这与学界所研究刚毅清赋中江南士气之低迷形成强烈对比,安徽清赋在效果及社会影响上也应与江南清赋之情形作一比对。

三 清赋的效果与社会影响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之后,安徽各县清查田赋基本结束。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安庆清赋总局正式裁撤^⑥。作为甲午战后较早响应“凑解军需”策略的光绪朝安徽清赋运动,其实际效果并不显著,这一点通过与刚毅江南清赋的结果进行对比便可知晓。在清赋推行过程中,往往激起地方矛盾与冲突,透过这些冲突可以发现,旧制度中孕育着的新变化,与江南的情形有所不同。

安徽清赋的成效可以通过增加税银数额、展复荒田数额知晓。《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记载,此次清赋按银米折算,共增加税银 14 万余^⑦,《田粮总册》载,通共连米折银 142 834.25 两,二者记载一致。《田粮总册》的记载较为详细,从中可知安徽省原荒田有 6 133 362.187 亩,光绪二十二年及光绪二十三年各县先后呈报清赋案内共清出 2 109 879.993 亩。简单计算可知,此次展复田亩数额大约占原荒田数额的 34.4%,这也与“计得原缺荒田十分之三”^⑧的记载相符合。但由于没有全面清丈,其 14 余万两清出数额仅停留在呈报数字层面,是否能够全部足额征收并上缴户部不得而知。在光绪二十三年邓华熙的奏折中有“安徽省各属荒田虽经设法查垦,续有垦复,而余剩类多硗瘠,骤难刻致复额”^⑨之语,说明展复旧额的预定目标可能并未达成。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安徽省正供之亏欠,已逾旧额^⑩,查荒或亦仅得一时之效。

对比江南的情形,刚毅南巡预期从清理苏省财政而筹措款项 1 941 540 两,增幅约在该省总收入的 9.7% 至 13.68% 之间。刚毅在江苏乃全面清理财政,其 194 万余两包括田赋、厘金、盐税等款,田赋只是其中一项。从田赋来看,其预估苏属地区地漕每年增多 60 万两,地丁 20 万两、漕粮 40 万两。

①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四七九,第 13090 页。

② 刘重光、杨世奎编:《安徽贵池南山刘氏瑞芬公世珩公支系史乘》,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3 页。

③ 《札飭贵池修粮赋各册》,《安徽藩司公牍》,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

④ 婺源县也存在缮书私造“暗号册”的情况(《安徽省清理田赋案牍辑存》,《中国华东文献丛书》第 3 辑第 93 册,第 190 页)。

⑤ “惟闻宣城有(麟)册可凭,其余各属,仅有大块册式”(《清赋纪略》,冯煦主修、陈师礼纂:《皖政辑要》,第 262~274 页)。

⑥ 《呈抚宪》(六月),于荫霖辑:《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卷四,第 22 页。

⑦ 《详两院宪》(六月),于荫霖辑:《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卷四,第 21 页。

⑧ 《于荫霖传包》,台北“故宫博物院”大清国史人物列传及史馆档传包、传稿目录资料库,文献编号:702003448。

⑨ 《奏请将安徽省应征光绪二十三年各漕仍循旧章折征银两飭司按限批解部库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奏折与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文献编号:141812。

⑩ 《清赋纪略》,冯煦主修、陈师礼纂:《皖政辑要》,第 263 页。

刚毅在江南的清赋效果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被清廷认为实在可靠,增收款项均落到实处^①。仅就州县而言,常熟、昭文二县展复荒额近一半^②。而安徽省清赋不仅田赋收入增加无几,展复荒额的收效亦不显著。安徽省下辖八府,其中以徽州府最无成效,仅歙县、绩溪呈报清出11 069.76亩,其他各县如婺源、休宁,虽与安庆清赋总局有公文往来,但均未呈报最终数额。安徽省清赋稍早,各项措施均属尝试,清赋机制尚不成熟,很难完全与后来江南的清赋等同对比,但清赋实际效果不佳也是不可否认的。

如果再对比士绅群体在清赋运动中的表现以及地方社会变化,较之以常熟徐兆玮^③为代表的传统江南士绅在刚毅清赋期间表现出的士气低迷,目前来看,无论是最具成效的贵池县还是最无成效的徽州府黟、歙二县,均让我们看到士绅的活跃和情绪之高涨。这种积极的地方政治参与,皖南诸县士绅保持了惊人的相似性,与江南的情形迥然不同。

在贵池县清赋中,王源翰作为士绅的代表,为清赋之事前后奔走,亲身破除旧习,号召士绅联合,可谓不遗余力,直到清赋结束后的第五年(光绪二十七年),王源翰仍然在竭力维护清赋的成果。在整个清赋运动中,贵池县诸士绅联合行动并成立了四乡公所,该公所由此成为诸乡士绅入城之据点,是士绅谋求自治,摆脱保书经征弊病诉求的集中体现,代表了乡民的利益。此公所也意味着贵池士绅谋求自治的开始,维新变法以后,贵池县的自治公所即设于此,并沿用四乡公所、四乡局之名。1911年11月自治公所改组,成立贵池县临时参事会,后改为临时议会,清赋诸士绅如章学文、张彬均列席议员^④。“四乡公所”作为旧制度的遗产,同时也孕育着新的社会力量。贵池县的士绅在与胥吏抗争的道路上不仅仅是通过四乡士绅联动,而且发动了跨域的社会网络。

光绪二十年至光绪二十二年,同处安徽南部的徽州黟县、歙县士绅也就田赋征收向知县及胥吏发起了抗争,屡屡控诉,上至巡抚、布政司、皖南道衙门,下至府县衙门,总数达34次,其中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上控至布政司署联名士绅数多达76人。相较贵池清赋,徽州的控案发动了更多本地士绅参与,同样利用了跨域的社会网络,并且有效地借助“曾文正公定章”这一太平天国战争后曾国藩在安徽留下的制度遗产,与各层级地方政府博弈。鉴于清赋前士绅群体活跃的上控情形,省级政府并未在徽州强制推行清赋,各县陈报效果亦颇不佳,并且在安徽整体急需增加实征数额的形势下,黟、歙士绅群体的减赋愿望却得到了满足^⑤。

综上,福润、于荫霖安徽清赋与刚毅江南清赋相比,实际效果略显不佳。在整体清赋的形势下,即便清赋伊始安徽省衙门便颁发章程、告示,清赋期间也屡屡札催、巡查,行政过程中省府与州县官员、胥吏、士绅对清赋的认识及应对有显著差异。虽然皖南士绅的联合和跨域互动十分明显,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度,但出发点和目的不尽相同。在清赋增税共识无法达成的情况下,对立、冲突、斗争、妥协不断在地方社会交替上演。安徽清赋对于荫霖而言或许具有特别的意义,台北故宫所藏清国史馆档与民国清史馆档中的清人物传记资料中有如下记载:“公(于荫霖)抵藩司任后,以为朝廷需款孔亟,与其筹款,莫若清赋……办理未久,福公(福润)去,事遂中辍,然已查出隐熟新垦田一万八千七百垧有奇,计得原缺荒田十分之三。”^⑥这一事迹在《清史稿》“于荫霖传”中被描述为:“增垦田万八千余亩,撙节库储二百万金”^⑦。与于荫霖同时期担任按察使的赵尔巽在编撰《清史稿》时显然将清赋视为于氏

① 何汉威:《从清末刚毅、铁良南巡看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1997年,第81页。

② 赵思渊:《清末苏南赋税征收与地方社会——以光绪二十五年刚毅南巡清理田赋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79页。

③ 徐兆玮,常熟人,著有《徐兆玮日记》,晚清江南士绅代表人物,刚毅南巡期间有“吾邑士气斫丧已极”之语[详情请参见赵思渊:《清末苏南赋税征收与地方社会——以光绪二十五年刚毅南巡清理田赋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73~84页]。

④ 《贵池文史资料》第4辑,1994年,第23、24页。

⑤ 歙县公控钱粮案,笔者已另文撰述,此不赘述。

⑥ 《于荫霖传包》,台北“故宫博物院”大清国史人物列传及史馆档传包、传稿目录资料库,文献编号:702003448。

⑦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四四八,第12523页。

署安徽布政使任上的主要业绩,这或许是《酌存》《辑存》等得以刊印并保存的原因。

收稿日期 2018-12-15

作者舒满君,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世界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后。福建,厦门,361000。

Study on Anhui Taxation Investigation Campaign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Guangxu

Shu Manjun

Abstract: In the 22nd year of Emperor Guangxu's reign (1896), Fu Run, governor of Anhui province, asked for conducting taxation investigation. The officials in Anhui province expected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farmland taxation, and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Treasury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by checking the barren and concealed farmlands. Thus, a specialized agency called General Administration for Taxation Investigation was set up in Anqing to promote the taxation investigation. The checking list had to be rewritten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which inevitably touched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parties, such as provincial and county officials and gentry, and eventually turned the investigation into an economic power struggle. The investigation in Guichi county was a case in point. By summarizing the process of Anhui taxation investigation, we can deeply understand the provincial and county interaction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wrangl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Moreover, we can re-recognize the effect and social impact of this activity.

Keywords: Guangxu's reign; Anhui taxation investigation; Guichi county; roster dispute

【责任编辑 张秀丽】

(上接第 35 页)

Shuang Ji's Establishment of Koryo's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 Foundation of Korean Thought of "Little China"

Huang Xiuzhi

Abstract: Betwee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immigrants, represented by Shuang Ji, played a substantial role i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Later Zhou Dynasty and the Koryo Dynasty both faced the threats of vassal nobles and Khitan. As a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 of the Later Zhou Dynasty and an envoy to Koryo, Shuang Ji was stranded in Koryo because of his illness. Attracted by the talent policy of Koryo, he was appointed by King Kwangjong of Koryo as the imperial secretariat. He introduc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o Koryo,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King Kwangjong's efforts of rejuvenating the royal power and rebuilding Koryo's institutions. Besides, he facilitated the thriving of Koryo's talents and the spread of Confucianism, established the centralized system, and cultivated the emerging scholar-bureaucrat class in Koryo. His activities became an important origin of the dynastic power of Chosŏn and laid the institutional as well as cultural foundations for the thought of "Little China". The intense criticism of Shuang Ji and his imperial examination by the later generations just reflected the profound and fundamental role he played in the dynastic system of Chosŏn and the thought of "Little China".

Keywords: the period of Five Dynasties; Shuang Ji; Koryo's imperial examination; King Kwangjong of Koryo; royal power; Little China

【责任编辑 汪维真】